



人·民·文·库
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

遵义会议文献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央档案馆

 人民出版社



人·民·文·库
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

遵义会议文献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央档案馆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牧野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陈 岩

责任校对:吕 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遵义会议文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

(人文文库)

ISBN 978 - 7 - 01 - 008019 - 2

I. 遵… II. ①中…②中… III. 遵义会议(1935)-文件-汇编

IV. 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6135 号

遵义会议文献

ZUNYI HUIYI WENXIAN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档案馆编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9.75

字数:125 千字 印数:0,001 - 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08019 - 2 定价:1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人民文库》编委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连儒 王善迈 止 庵 田士章 叶秀山
庄浦明 庄福龄 张立文 张世英 张作耀
张惠卿 张静如 吴道弘 陶文钊 顾锦屏
蔡美彪 薛德震

主 任 黄书元

副主任 陈有和 张小平 任 超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国根 李春生 乔还田 刘丽华
张文勇 张振明 张耀铭 陈亚明
陈鹏鸣 郁中建 喻 阳

人民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本公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本公开出版的政治理论著作《列宁选集》的出版者，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党的重大理论成果的出版者。

《人民文库》出版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 1921 年 9 月，重建于 1950 年 12 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大变一 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 2 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人民文库》第一批以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图书为主，

分为以下类别：（1）马克思主义理论，（2）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人文科学（包括撰著、译著），（4）人物，（5）文化。首批出版 100 余种，准备用两年时间出齐。此后，我们还将根据读者需求，精选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

由于文库入选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一方面为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将原来的繁体字、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另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对于有些入选文库作品的版式、编排，姑仍其旧。这样做，也许有“偷懒”之嫌，但却是我们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作品恒久价值的一片用心。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我们深知人民出版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再创人民出版社的辉煌。

前言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占领的贵州遵义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批判了中央红军指挥机关在反对蒋介石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决定采取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在会议以后不久，中央政治局改变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工农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保证了它战胜种种困难而完成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入节节胜利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遵义会议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点。

一九八五年一月是遵义会议的五十周年。为了适应全党和全国人民了解遵义会议内容的需要，我们编辑了《遵义会议文献》。本文献收集了会议的决议、中央关于通报会议情况的电报、中央负责人关于会议的传达提纲、中央后来对这次会议意义的正式估价（以上为第一辑），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关于这次会议的论述和回忆（以上为第二辑）。绝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本文献资料除注明是中央档案馆存件的以外，都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或编辑的；各篇的注释（除张闻天同志一篇的注释承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提供外）也是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所加。

目 录

第一辑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3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	31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36
(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录)	48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录)	51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第二辑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节录)	55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节录)	58
(一九三八年十月)	
战争和战略问题(节录)	61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共产党人》发刊词(节录)	63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讲话(节录)	毛泽东 65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六月十日)	
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周恩来 68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党的历史教训(节录)	周恩来 70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	
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朱德 75
(一九四四年)	
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	陈云 78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	张闻天 81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提纲节录)	刘伯承 88
(一九六二年七月)	
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聂荣臻 99
(一九八三年)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秦邦宪 109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节录)	秦邦宪 110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	
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节录)	伍修权 116
——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	
(一九八二年)	
[附录]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	
调查报告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30
(一九八四年九月)	

第一辑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

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①政治局会议通过)

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同志^②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③中，曾经清楚地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

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④。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地扩大了。模范赤少队^⑤开始成为红军的现成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彻底的改善,更大大的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应该指出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党对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的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报告与结论中却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那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四、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历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⑥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⑦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五、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

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围剿”，保卫苏区，并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这一战略路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的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骄矜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的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的恰当的部署战斗。不要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的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止他，应该待他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一切这些，都为着使红军能够经常主动的有